



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

文本中的历史

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

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 Tibetan Buddhism
in Central Eurasia and China Proper

沈卫荣 主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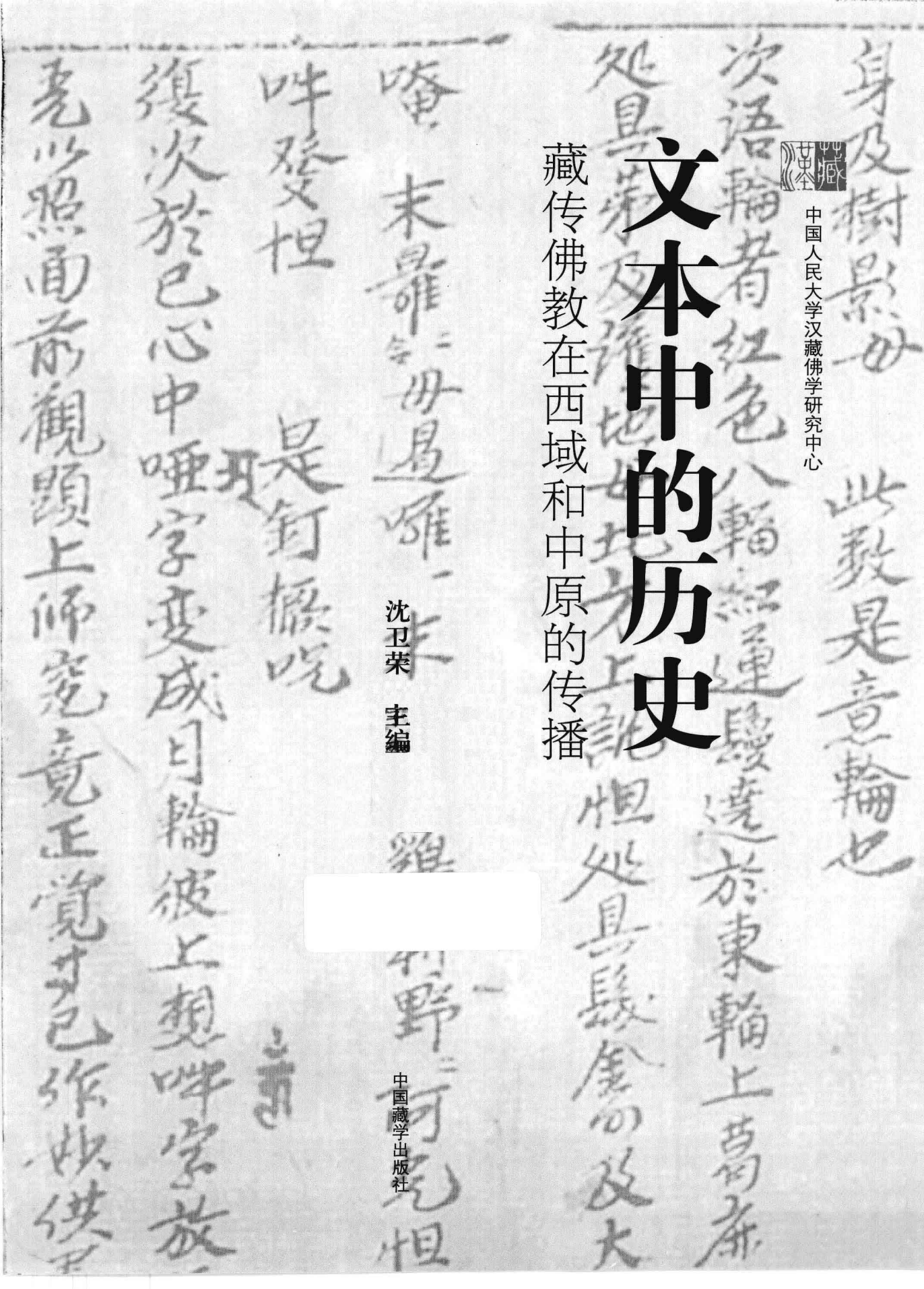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

文本中的历史

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

沈卫荣 主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 / 沈卫荣主编.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80253 - 547 - 3

I. ①文… II. ①沈… III. ①喇嘛宗 - 文化传播 - 文集

IV. ①B946.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4305 号

本书所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

沈卫荣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9.75
字 数	953 千
印 数	2000 册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547 - 3/B · 148
定 价	120.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沈卫荣

一

2008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术机构——“汉藏佛学研究中心”。自此四年多来，该中心的师生们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积极倡导汉藏佛学比较研究，鼓励以语文学的方法整理汉、藏文佛教文献，从多语种佛教文献的比较入手研究汉藏佛教的历史和教法，并致力于“汉藏佛学研究”这一学科之基础的构建。本书所集的大部分篇章即为近年来他们所开展的多项学术课题研究，特别是被立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品牌项目的“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和被列入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研究计划的“黑水城出土西夏佛教文献研究”两个科研项目中取得的部分阶段性学术成果。这些文章从研究方法到文字表达或均尚嫌拙朴、稚嫩和粗糙，有待琢磨、精炼和提升，但在作为一个新建的学术机构——“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和在作为一个正在构建中的新学科——“汉藏佛学研究”的历史上，无疑它们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

本书的标题《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很准确地反映了本书的主题和内容，及其中所表明的作者们的学术追求，即通过对汉、藏、西夏、维吾尔、蒙古、满文佛教文献的发掘、整理、解读和研究，来重构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

大概自公元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占领广大西域地区，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吐蕃帝国开始，藏传佛教就已经渐次在西域各地传播，并在这个宗教和文化的大熔炉中开始了与汉传佛教互动、交流的历史过程。以后，随着回鹘政权、西夏王朝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兴起，藏传佛教于西域的传播日趋广泛和深入。及至元代，西番僧人位居帝师之尊，领天下释教。于是，藏传佛教不但在蒙古宫廷中大行其市，而且也开始在中原各地逐渐流播，并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继元而起的明、清两代，从宫廷到民间，修习藏传佛教蔚为风气，业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景象。

可是，在传统的汉文历史文献中我们很少能够见到有关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资料。不管是在官修正史，还是在私家撰述中，我们都极少能够见到有关藏传佛教的具体和确切的记载，故无从弄清藏传佛教如何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真实面貌。而且，由于受政治上的冲突、文化间的隔膜和文字中的障碍等原因的影响，即使是汉族士人笔下有关藏传佛教的零星记载也还充满了渲染不实和晦涩难解之词，它们不但难以帮助我们构建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而且常常误导读者曲解藏传佛教。

显然，要构建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必须要发掘传统汉文历史文献以外的资料，特别是佛教文献和非汉文历史、宗教文献资料；充分掌握不同语种的佛教文献，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这是研究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历史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近代佛学研究最优秀的学者吕澂先生无疑是杰出的开路先锋，而我们则正追随着他的足迹，努力开拓和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值得庆幸的是，当我们开始用心收集出自西夏和元代的不同语种的藏传佛教文献时，我们很快就发现目前已知的这类文献资料的数量已经相当巨大，而且还有前人不知的文献不断被考古、发掘出来。可颇为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这类文献的认识和研究严重不足，所以还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掘出其潜在的学术价值，致使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此即是说，尽管目前可供我们研究的不同语种的佛教文献事实上已经相当丰富，可是，由于历史学家们尚没有对这类文献资料予以足够的重视，或者尚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读和研究这一类非汉语文的和纯粹宗教性质的文献，所以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

播的历史面貌尚未清晰地呈现出来，还有待于我们去作深刻的发掘和研究。

三

毋庸置疑，今天能为我们构建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提供帮助的多语种佛教文献当首推敦煌古藏文文献。自上个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迄今百余年间，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不但帮助我们重建了吐蕃王朝生成、发展的历史，而且也国际藏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它一直是藏学研究的前沿重镇和风向标。早期的西方藏学大家们多半把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对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世俗、社会和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解读确定了一部吐蕃历史的基本框架。上个世纪 70、80 年代，一批日本佛教学者集中整理和研究了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与汉传禅宗佛教相关的文献，揭露了汉传禅宗佛教一度曾在吐蕃广泛流传的历史故实。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对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特别是藏传密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逐渐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主流，新著迭出，成果卓著，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新阶段。

然而，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即如何依靠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来研究吐蕃时代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的互动关系，却迄今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作为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敦煌地区历来是各种宗教、文化集聚、交流的大舞台，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也曾经于此交汇、碰撞，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不难想见，当时业已发展成熟了的汉传佛教曾经对新生和成长中的藏传佛教产生的巨大影响。可是，以往的研究却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很少有人尝试从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发掘新资料，揭露除了禅宗佛教之外其他汉传佛教传统对藏传佛教传统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足够注意敦煌地区佛教的发展对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展及其密教传统的形成有可能产生的直接影响。而这些正是我们今天从事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研究最应该重视的内容，把它们努力地做好了，则一定是我们中国藏学学者对国际藏学研究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

与敦煌藏经洞的被发现差不多同时，俄国地理学家柯兹洛夫在今天位于中蒙边境地区、中国内蒙古西北额济纳旗的黑水城发现了大量源自西夏和蒙元时代的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等文字的世俗和宗教文献。这些文献在时间上正好与敦煌文书前后相继，在内容上也与敦煌文书一样包罗万象，为构建 11 世纪以后以丝绸之路为主线的西域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资料。然而，与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在过去的百余年间形成为一门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学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黑水城文书的研究长期以来却成为有数几位俄罗斯、日本学者之专擅。虽然对黑水城文献，特别是其中的西夏文文献的研究，奠定了现代西夏学研究，

特别是西夏语言研究的基础;但是,百余年间能够直接接触和利用黑水城文献的各国学者寥寥可数,其中的绝大部分文献并没有得到整理和利用,其学术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理解。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才使这批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重见天日。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我们居然发现了一大批源于西夏和元朝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与藏传密教修习相关的仪轨。显然,它们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这个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对它们的初步认定,便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事实:藏传佛教早在西夏王国时代就已经开始在西域和中原传播,蒙古人如此迅速地接受藏传佛教实在有其深刻的西夏背景。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形形色色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不但是研究西夏和元朝时期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历史的最直接的资料,而且,它们也是我们研究后弘期初期藏传佛教之历史的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它们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理解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历史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若把黑水城出土汉译、西夏文译藏传佛教文献和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研究的话,从中或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藏传佛教于敦煌地区前后发展之历史脉络。而理清了这一历史脉络,则不难发现从敦煌后期密教的兴起到其后藏传密教于西夏、回鹘的传播,它们之间的发展或一脉相承,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域地区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形成、发展之历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被发现之前,我们唯一知道的此类文献是《大乘要道密集》。这是一部汉译藏传密教仪轨集成,传统上被认为是元朝帝师八思巴“辑译”,故而是元代的作品。在清乾隆年间从热河流出宫外之前,这部宝典是元、明、清三代宫廷秘修藏传密教的根本所依。民国十九年(1930),由北平藏传佛教信众发心抄印五十部传世,自此便成为中原汉地民间修学藏传密教所依据的首要法本。《大乘要道密集》中收集了八十部长短不一的仪轨,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萨思迦派所传之“道果法”的法本,其中有对其教法之根本——《道果金刚句偈》的长篇释论,也有许多实修的短篇仪轨,还有一系列萨思迦派上师所传的“大手印”修法。这些文本除了少数赞颂和修造塔、像的尺寸法、庆赞等外,均为实修密教的要门、修法,反映出了元代宫廷所传、修之藏传密教的基本面貌。

由于《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文本全部是纯粹宗教性的修法和仪轨,对于缺乏对藏传密教有全面和深入了解的读者来说,它们无异于天书,很难读懂其中的任何一个文本,更不用说把它们用作研究藏传佛教于中原传播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了。因此,尽管《大乘要道密集》于宗教界被珍视为传世的秘宝,可在学术界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当我们在《俄藏黑水城文献》内发现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之后,《大乘要道密集》自然而然地再次跃入了我们的视线。不难看出

出，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些文本与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那些汉译、西夏文译藏传佛教文献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有些甚至互相重合、一致，它们属于同一性质、同一源流。还有，不管是黑水城出土佛教文献，还是《大乘要道密集》，它们中部分文书的内容与上个世纪初在吐鲁番发现的古代维吾尔文佛教文献也有许多共同和重合之处，这使得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对《俄藏黑水城文献》、《大乘要道密集》和吐鲁番古代维吾尔佛教文献的研究应该同时并举，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都是我们尝试建构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历史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资料。

当我们致力于整理、研究上述藏传佛教文献资料的同时，我们又十分惊讶，更备受鼓舞地发现，今天还有许多类似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依然存世，等待我们去发现。我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发现了八种与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密教文献类似（部分重合）的文书，其数量足可汇成另一部新的《大乘要道密集》。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内还收藏有两卷专修观音菩萨的仪轨集成，分别名为《修习要门》和《观音密集玄文》，其中收录了二十余种修习各种形象的观音本尊的仪轨。同样，我们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也发现了两部明代抄写的萨思迦派上师所传修习“喜金刚”和“顶髻尊胜佛母”的长篇仪轨；在辽宁省图书馆还发现了当年由罗振玉先生在清代内阁大库中发现的、被他命名为“演揅儿法残卷三种”的西夏和元代所传译的多种藏传密教仪轨文献残本。再有，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宁夏自治区的考古学家们于西夏故地如拜寺沟、山嘴沟等地相继发掘、发现了大量源自西夏时代的汉译、西夏文译藏传佛教文献，其中既有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本续，如《吉祥胜乐本续》、《三菩怛本续》等的汉译、西夏文译本的残卷，也有多种修习各种密教本尊的仪轨。

总而言之，仅就上述目前我们手中已经掌握的这些不同语种的藏传佛教文献而言，构建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已绝不再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使命了。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不但足以帮助我们成功地构画出西夏和蒙元时代藏传密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历史的基本图景，解开藏传佛教对外传播史上的种种谜团，而且，也将对藏传佛教后弘期历史的研究，甚至对中国密教史的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

迄今为止我们手中掌握的各种语文翻译的藏传佛教文献无疑已经相当丰富，然而，如何来处理和研究这些文献以揭示它们的历史的和宗教的价值，则是我们曾经面临的一个难题。上述所有这些多语种藏传佛教文献均为纯粹的宗教文献，它们并不提供很多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信息。除了文本的原作者和译者的名字之外，

我们常常对这些文本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其中的不少文本甚至连原作者和译者的名字也都付之阙如，更没有题记或者序跋类的东西可供我们钩沉索隐。此外，这些文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而每每只是一部整体文献中的某个章节或者部分，要确定其来历实在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大概正是由于这类纯粹宗教性质的文献不但其内容难以为非专业人士所理解，而且它们能够提供的历史信息极其有限，所以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对处理这类文献感到一筹莫展，以致长期以来对它们视而不见，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更没有人用心对它们作过深入的研究。

然而，要弄清藏传佛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之历史故实，除了下功夫研究这些文献，从中找出我们期待的历史线索之外，无其他途径可循，也没有其他文献资料可以依靠。所以，即使我们的着眼点不是研究藏传密法本身，而是要还原藏传密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的历史真相，我们也只有通过对这些具体的宗教文献进行深入和细致的文本研究才能最后达成这个目的。而要从这些数量和内容都相当丰富的宗教文献中抽丝剥茧，让它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历史资料，唯一方法就是对它们作细致的语文学的处理。换言之，只有通过对这些宗教文本的语文学式的文本解读、分析和研究，我们才能最终建构出这段历史的真实图景（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

要说清楚我们手中掌握的这些不同语种的藏传密教文献作为历史和宗教文献的价值，我们至少需要做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们需要对这些文本作语境化的处理（contextualization），即弄清它们生成、流传的来龙去脉，同定其藏文原本，考察其传译过程，尽可能多地发掘和它们性质类似、内容相近的文献，并对它们作仔细的比较和研究，从而还原出这些藏传密教文献生成和流传的具体的历史、语言、宗教和文献背景（语境）。第二，我们需要对这些文本本身作细致的语文学的处理，不但要厘定文本内容，确定文本的源流、成书年代和过程，而且还要仔细地比较不同语种的文本，逐字逐句地解释这些文本的内容及其含义，以理解它们所传播的教法，并将它们置诸于藏传密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这一历史和宗教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进而对它们与藏传密法在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关联作出合理的解释。

具体而言，我们必须通过对每个文本之藏文原本的同定、其传承脉络的理清、著译者身份的确定，以及对照和比勘不同语种的文本、确定其译语的特征和前后变化等，大致确定这些文献的形成年代、传译过程和流传途径、范围等，进而勾画出藏传密教在西域和汉地传播历史的大致轮廓。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这些文本所传的教法、仪轨从佛教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和诠释，以正确理解这些修法和仪轨的具体内容，揭露其丰富的宗教内涵和本质。对每一个具体文本的研究是对藏传佛教中的一个修法、仪轨和传统的介绍、研究和诠释，它必须突破历史研究的范畴，而成为佛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从佛教学角度对这些文本进

行研究和诠释,那么我们所能勾画的藏传佛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的历史就一定是不完整的,它只有筋骨而没有血肉。只有对这些文本的宗教内容做出合乎其语言、历史和宗教语境的诠释,我们才可以彻底消除“文字障”,解决以往学者没法解决的对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藏传密教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解释问题,同时也将这些通常被认为是秘密而不可示人的密法的真实内容揭露出来,以破除历代汉族士人因受制于文化偏见和民族情绪而对藏传密教所持的种种误解和歪曲。

五

收录于《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的传播》一书中的这二十余篇基本上就是遵循上述学术理路,尝试用语文学的方法,整理和研究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自西夏至明代出现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以及其他非汉文佛教文献,旨在通过精细的文本研究,解读、诠释这些艰涩难懂的密教文献,进而揭示藏传佛教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这些文章既是宗教文献学研究的作品,同时也是历史学、佛教学的研究著作,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的特征。我们所尝试的这种跨学科、综合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各个单科学术领域的专家看来或有失于专业的精致,但我们相信这是整理、研究上述这类文献应当采用的最可行、最基础,也最有成效的学术方法。

本书有关“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有四篇,才让的《P. T. 996 号第一部分〈禅师南喀宁波善知识传承略说〉之再探讨》一文,以法藏敦煌藏文文献 P. T. 996 号为中心,结合在“塔波文献”中发现的《大瑜伽修习之义》,通过对该文书的译注与解读,进一步挖掘了其所含的历史、宗教、职官和地理等信息,总结了禅师南喀宁波的生平及其著述,指出其思想兼有禅宗和密教的双重特点,对进一步研究吐蕃末期河湟地区的佛教有启发意义;任小波的《敦煌 ITJ 687 号法成〈业报要说〉残本新译——兼论〈善恶因果经〉的藏译者释迦光的身份问题》,不仅重新翻译了敦煌 ITJ 687 号法成的《业报要说》,而且对文本做了细致的比勘,通过与法成藏译《善恶因果经》的语词比较,探讨了释迦光的身份问题,指出《善恶因果经》并非源自梵文,而应译自汉文;李婵娜的《九至十一世纪的吐蕃观音崇拜——以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为中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综合梳理敦煌古藏文文献中有关观音崇拜的文书,揭示出 9—11 世纪前期吐蕃地区观音崇拜的基本状况;李建强的《从对音材料看九世纪前后敦煌地区藏语的语音特点》,通过藏汉对音材料的研究,指出最晚在 9 世纪时,藏语方言中单独的浊音字母已经清化。

有关“西夏时代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有三篇:孙鹏浩的《有关帕当巴桑杰的西夏汉文密教文献四篇》,分析考证出黑水城文献和《大乘要道密集》中四篇不同体裁,但均与息解派(Zhi byed pa)祖师帕当巴桑杰(Pha dam pa sangs rgyas)

有关的汉译密教文本，指出帕当巴桑杰的教法在西夏时代已在汉文化圈中流传，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藏传佛教于西夏传播的历史，而且亦对 11 世纪的印藏佛教史研究，特别是使息解派的早期历史从神话归于现实，有着极为难得的意义；梁珏的《十一至十四世纪西域与内地的胜乐修持文献——拜寺沟方塔出土〈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之注释〈无垢……〉研究》，以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汉译佛典《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之注释《无垢……》为中心，结合与之相关的藏、汉、西夏文胜乐文献，对 11—14 世纪的胜乐修持进行了简要梳理，并对相关的胜乐崇拜进行了简单总结；杨杰的《绒宋·法贤所造〈建立显现为本尊〉说略》，对宁玛派大学者绒宋·法贤（Rong zom Chos kyi bzang po）所造《依密咒金刚乘之理建立显现为本尊》（*gSang sngags rdo rje theg pa' i tshul las snang ba lhar bsgrub pa rong zom chos bzang gyis mdzad pa bzhugs*）的理论来源、论证方式及其学说对后世宁玛派学者，尤其是不败尊者（Mi pham rgya mtsho）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于“汉译萨思迦派文献”的研究有六篇：柴冰的《〈端必瓦成就同生要〉藏汉文对勘及考述》与孟瑜的《国家图书馆藏〈大手印无字要〉研究》，分别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初述古堂抄本”中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端必瓦成就同生要》和《大手印无字要》为研究对象，对其藏、汉文本进行同定与对勘，为进一步挖掘其所蕴含的历史、宗教信息打下了基础；安海燕的《萨思迦班智达造〈大金刚乘修师观门〉汉、藏本对勘》，对《大乘要道密集》所收明代译师莎南屹啰的译作《大金刚乘修师观门》进行了藏、汉两种文本的细致对勘，通过将其藏文原本所引诸多经续内容与莎南屹啰汉译文对照后发现，莎南屹啰译文所用经续引文并未直接译自萨思迦班智达的原文，而是直接照搬了汉译佛经中的原句，这揭示出莎南屹啰对汉译佛经是相当熟悉的，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莎南屹啰的时代和翻译特征提供了依据；张凌晖的《朵波巴摄啰监灿班藏布和他的〈总释教门祷祝〉》，简述了朵波巴（Dol po pa）的生平及其“他空见”思想，并对《大乘要道密集》所录朵波巴的《总释教门祷祝》的藏、汉文本做了对勘；李梦妍的《萨思迦班智达所作〈三律仪分别〉与西藏的“三律仪”文献》，介绍了《三律仪分别》的主要内容、写作背景、研究概况以及相关的藏文文献；杜旭初的《〈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汉藏对勘及文本研究》，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的藏文来源做了精心的考证，为进一步研究顶髻尊胜佛母崇拜及其于西夏和汉地的传播提供了文本依据。

有关“印藏佛教艺术”的研究有两篇：张丽香的《印度佛传图像模式在雕刻中的发展演变》，考察了印度佛传图像从最早的单图单景到晚期的波罗八相圆碑的发展过程，对研究西藏、新疆以及汉地的佛传图像模式的历史发展有所裨益；廖旻的《藏传佛教艺术中的狮柱塔及其演变》，从文本与图像的双重角度，考察了藏传佛教艺术中的“狮柱塔”，探讨了其所象征的宗教内涵，追溯了其形制与量度等

的演变及动因，展现了藏式佛塔的发展历程。

有关“满蒙文佛教文献”的研究有两篇：王曦的《藏满蒙汉四体合璧〈妙轮上乐王秘密不思议大教王经〉》，介绍了藏、满、蒙古和汉文四体合璧的《妙轮上乐王秘密不思议大教王经》，分析了该文本所体现的四种语言的特点及其关系，指出了其对理解和研究这部藏传密教仪轨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孔令伟的《〈金刚经〉满文译本初探——论满洲本位政策与清代译经事业》，通过对清内府朱印本满文《金刚经》的逐字译注，并将其与比利时东方学家哈雷（Charles de Harlez, 1832-1899）所发现的满汉二合本《金刚经》相互比对，初步探索了两种《金刚经》中的满文特色，进而说明《清文全藏经》译文背后所蕴含的满洲本位政策，促使清朝皇帝积极推动汉藏佛经的校勘工作，以彰显满洲文化兼容汉藏的主体性与优越性。

有关“元明清汉藏佛教史事考证”的研究有四篇：沈卫荣和李婵娜的《“十六天魔舞”源流及其相关藏、汉文文献资料考述》，通过检索藏、汉文文献中有关“十六天魔舞”的记录，揭示了元代宫廷中所流行的“十六天魔舞”实际上来源于吉祥上乐轮中围仪轨中作为“意生供养”的“十六明母”（rig ma bcu drug），汉文文献中对“十六天魔舞”所作的情色化的渲染和曲解则完全脱离了其原有的宗教语境。作为上乐轮仪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早在西夏时代就已经传入西域，而八思巴帝师也早在1250年代就在忽必烈汗的潜邸开平府开始传授这种仪轨，文章从文献学角度，详细梳理了有关胜乐轮信仰的藏文文献，并翻译了八思巴和布思端两位上师所造有关“十六明母供养舞蹈”的三篇仪轨，以便读者了解这种舞蹈的真相；闫雪的《〈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初探——从乌贤大王图像及相关文本出发》是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的初步研究，它以文中所载“乌贤大王”图像为线索，结合相关文本，对该经做了初步分析与探讨，为进一步揭示该经的内涵及其所隐藏的历史、宗教背景提供了大量线索；贾维维的《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北京活动及相关史事再考——以〈西天佛子源流录〉为据》，以《西天佛子源流录》为中心，对大智法王在北京的活动及其相关的史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陈庆英和王晓晶的《六世班禅东行途中随从种痘考》，从二世嘉木样活佛与六世班禅的关系着眼，阐述了二世嘉木样活佛率领班禅大师的随从在东行途中前往阿拉善种痘而班禅大师却未种痘的原因，分析了班禅大师在北京染天花圆寂的始末，为解开这一历史谜团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六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师生所倡导和从事的“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2009年，我们从事的“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就被立为“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品牌项目”；2010年，我们开

展的另一个科研项目“黑水城出土西夏佛教文献研究”又被列入“中国人民大学重大基础 Research 计划”。自“汉藏佛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的四年间,我们从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领导部门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十分难得的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我们所积极倡导和努力构建的新学科——“汉藏佛学研究”所给予的学术上的积极肯定,和他们对我们师生不懈的学术追求所给予的道义上和精神上的有力支持。为此,我们要深深感谢冯惠玲副校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的各位领导。虽然,我们将现在出版的这本书作为上述两个得到学校科研处支持的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我们深知我们在学校科研领导部门支持下积极开展汉藏佛学研究的收获远不止此。随着这两个学术课题的开展,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内培养出了一批从事汉藏佛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必将是今后于国际学术界内从事汉藏佛学研究的生力军和领跑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与谈锡永上师和他主持的“北美汉藏佛学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这些年来我们的学生不但在佛学领域内的学习和研究上得到了谈上师的悉心指导,而且也在经济上得到了谈上师发起的“汉藏佛学基金会”的有力支持。“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各位同学的成长凝聚了谈上师的心血,当我们今天初尝胜果,取得目前的学术成绩时,我们谨向谈上师及他主持的“北美汉藏佛学研究会”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收录于本书中的绝大部分论文曾经在去年八月于无锡灵山梵宫召开的“首届两岸汉藏佛学研讨会”上发表,对于为我们这次学术会议慷慨地提供了极为宽敞、典雅的会议场所,舒适、精致的食宿条件和其他各种后勤保障的无锡灵山公司,特别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吴国平先生、接待部经理陈诗阳小姐,我们心存感激,并将铭记这一段极不平常的经历。同时,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对以不同方式为会议代表在无锡开会期间给予了道义上、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的无锡市政府秘书长吴峰枫先生、无锡市大东方百货集团总经理潘霄燕女士、无锡市吉祥会馆总经理陈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上述各位大德给予我们如此慷慨、无私的支持,无非是希望我们能够努力为佛教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而我们对他们的最好报答也只能是努力把汉藏佛学研究事业做好。对此我们充满了信心,但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最后,我们要对为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积极支持的中国藏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2 年 8 月 26 日

目 录

前 言 沈卫荣 / 1

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

P. T. 996 号第一部分《禅师南喀宁波善知识传承略说》之再探讨 才 让 / 3

敦煌 ITJ 687 号法成《业报要说》残本新译

——兼论《善恶因果经》的藏译者释迦光的身份问题 任小波 / 23

九至十一世纪的吐蕃观音崇拜

——以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为中心 李婵娜 / 36

从对音材料看九世纪前后敦煌地区藏语的语音特点 李建强 / 77

西夏时代藏传密教文献研究

有关帕当巴桑杰的西夏汉文密教文献四篇 孙鹏浩 / 85

十一至十四世纪西域与内地的胜乐修持文献

——拜寺沟方塔出土《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之注释《无垢……》研究

梁珏 / 98

绒宋·法贤所造《建立显现为本尊》说略 杨杰 / 130

汉译萨思迦派文献研究

《端必瓦成就同生要》藏汉文对勘及考述 柴冰 / 161

国家图书馆藏《大手印无字要》源流考述 孟瑜 / 207

萨思迦班智达造《大金刚乘修师观门》汉、藏本对勘 安海燕 / 243

朵波巴摄啰监灿班藏布和他的《总释教门祷祝》 张凌晖 / 284

萨思迦班智达所作《三律仪分别》与西藏的“三律仪”文献 李梦妍 / 301

《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汉藏对勘及文本研究 杜旭初 / 317

印藏佛教艺术研究

印度佛传图像模式在雕刻中的发展演变 张丽香 / 367

藏传佛教艺术中的狮柱塔及其演变 廖旻 / 381

满蒙文佛教文献研究

藏满蒙汉四体合璧《妙轮上乐王秘密不思议大教王经》 王曦 / 413

《金刚经》满文译本初探

——论满洲本位政策与清代译经事业 孔令伟 / 455

元明清汉藏佛教史事考证

“十六天魔舞”源流及其相关藏、汉文文献资料考述 沈卫荣 李婵娜 / 499

《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初探

——从乌贤大王图像及相关文本出发 闫 雪 / 565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北京活动及相关史事再考

——以《西天佛子源流录》为据 贾维维 / 573

六世班禅东行途中随从种痘考 陈庆英 王晓晶 / 599

作者名录 / 618

Contents

Preface	Shen Weirong (1)
----------------------	--------------------

Studies in D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s

A Research on the First Part of P. T. 996 <i>mKhan po nam ka'i snying po'i dge ba'i bshes nyen gyi rgyud mdor bshad pa</i>	Tshe ring (3)
A New Translation of Dunhuang Remnant Manuscript ITJ 687 , Composed by 'Gos Chos grub; with Some Inferences on Shākya 'od, the Translator of a Tibetan Version of the <i>Shan'eyinguo Jing</i>	Ren Xiaobo (23)
The Avalokiteśvara Cult in Tibet from the 9th to 11th Century: A study focused on the Dunhuang Tibetan Manuscripts	Li Channa (36)
A Phonetic Change of Old Tibetan in Dunhuang about the 9th Century Based on the Transcription Documents	Li Jianqiang (77)